

声誉需求、反噬成本与经济制裁强度^{*}

李 潇

【内容提要】 为什么制裁发起国有时采取低强度经济制裁,有时使用中等强度经济制裁,有时发起高强度经济制裁?既有研究主要从国内制度、双边关系和外交决策视角探讨经济制裁的发起逻辑,而较少关注经济制裁的形式选择及其强度差异。结合相互依赖武器化研究,本文以经济制裁的对象范围和权力手段为轴,构建了一个衡量经济制裁强度的指标体系,并借鉴强制外交研究的“决心-成本平衡理论”,尝试提出一个解释经济制裁强度的理论框架:发起国希望通过经济制裁建立决心声誉的需求越高,就越倾向于发起高强度经济制裁,但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会对其制裁措施选择产生限制。通过比较 2008 年俄格冲突期间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的低强度制裁,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的中等强度制裁,以及 2022 年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的高强度制裁,本文验证了这一理论框架的适用性。

【关键词】 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强度 决心声誉 美国 反噬成本

【作者简介】 李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师资博士后。
电子邮箱:877507367@qq.com

一战结束以来,在和平主义思潮、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秩序变迁等因素影响下,经济制裁对战争的替代与辅助性作用不断增强。^①根据全球制裁数据

^{*} 本文曾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十八届全国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论坛上宣读,感谢与会专家、同学以及朱杰进、刘建伟、庞琴、戚凯、吴文成等学者和《国际政治科学》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Nicholas Mulder, *The Economic Weapon the Rise of Sanctions as a Tool of Modern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1-21.

库(GSDB)的统计,1949—2022 年全球累计发生 1325 起经济制裁事件,引发许多重大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后果。^① 经济制裁种类繁多,如何衡量并解释发起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强度差异已经成为经济制裁研究的前沿议题之一。^② 本文旨在回答:同样是发起国的经济制裁,为什么制裁强度存在明显差异?为什么发起国有时使用低强度经济制裁,有时选择中等强度经济制裁,而有时发起高强度经济制裁?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探究美国经济制裁的行为逻辑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管控中美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在描述性理论层面界定了经济制裁强度,探讨了既有研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操作化,并根据经济制裁的对象范围与权力手段,构建了一个描述经济制裁强度的划分依据。其次,本文在解释性理论层面提出一个修正的决心-成本平衡理论,探讨制裁国通过经济制裁建立决心声誉的迫切程度,以及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对经济制裁强度的影响。最后,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比较了俄格冲突、克里米亚事件以及俄乌冲突中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行为差异,并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因果展示。

一、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一般认为,经济制裁是指制裁发起国通过威胁或实际切断与目标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对目标国造成损失或削弱其对抗能力,从而迫使其改变行为并服从制裁发起国政治偏好或条件的惩罚性工具。^③ 其中,经济制裁强度通

① Constantinos Syropoulos et al., “The Global Sanctions Database-Release 3: COVID-19, Russia, and Multilateral Sanc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Vol. 32, No. 1, 2024, pp. 12-48.

② 庞琴:《冲突视角下的美国对外经济制裁——规范成本、相互依赖与制裁僵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 年第 1 期,第 113—114 页。有关经济制裁的类型划分,参见刘建伟:《经济制裁:一项国际比较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6 页。

③ 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 页;张发林等:《金融制裁与中国应对策略——国际金融权力的视角》,载《当代亚太》,2022 年第 6 期,第 4 页;刘建伟:《经济制裁:一项国际比较研究》,第 3 页。受限于篇幅,本文并未对发起国与目标国非对称相互依赖的类型(4 种)及其对制裁强度的影响进行探讨,而仅在总体经济联系的层面讨论制裁强度。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这一点。

常以目标国经济成本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经济制裁有效性的条件之一。^① 针对“为何发起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强度存在差异”这一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国内制度、双边关系和外交决策等三个视角展开分析。

(一) 国内制度视角

国内制度视角倾向于将经济制裁理解为国内政治博弈的外部结果,发起何种强度的经济制裁取决于发起国国内“结构与行为体”的互动,包括选举政治说、利益集团说与府会关系说等。

1. 选举政治说

基于转移视线战争理论(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②选举政治说认为经济制裁不仅是为了胁迫目标国让步,也是发起国领导人为提高其国内政治支持率而开展的象征性外交表演。詹姆斯·琳德塞(James M. Lindsay)把经济制裁的政策目标分为强制改变、政权颠覆、威慑、国际象征性表达和国内象征性表达,并指出领导人发起经济制裁的目标之一是利用制裁来表明决心,从而挫败国内反对派的批评意见,^③尤其是当发起国领导人的无所作为可能被视选民视作目标国的同谋时,发起国领导人往往需要“做些什么”(doing something)来向国内发出信号,通过积极的对外制裁行动来提高选民对政府的支持度。^④ 库珀·德鲁里(A. Cooper Drury)认为,国内支持率较高的总统往往有较为充足的政治资本发起经济制裁,尤其是临近选举周期的总统更青睐通过大范围、高强度的经济制裁为竞选连任积攒外交

① 刘建伟:《国际制裁缘何难以奏效?——“非故意后果”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第118页;朱杰进、胡馨予:《经济成本视角下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3期,第59页。

② 转移视线战争理论指的是陷入国内信任危机的领导人通过制造外交危机来转移公众对其执政不满的注意力,从而延长其政治生命的行为。相关研究参见韩召颖、王耀辉:《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逻辑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2期,第12—13页。

③ James M. Lindsay, “Trade Sanctions as Policy Instruments: A Re-Examin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0, No. 2, 1986, p. 157.

④ James Barber, “Economic Sanctions as a Policy Instru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 No. 3, 1979, p. 381

政绩。^① 通过对美国总统对外制裁行为的大样本分析,黄泰熙(Taehee Whang)发现,经济制裁有助于总统树立热衷国际人道、民主事业的良好形象,因此即便明知制裁无助于解决实质性外交问题,美国总统也经常出于提高选民支持率及其连任前景的目的而发起对外制裁。^②

2. 利益集团说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利益集团说倾向于将经济制裁视作发起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偏好冲突与聚合的产物,经济制裁不是旨在对目标国施加最大伤害,而是在特定制裁制度下为最具影响力集团的利益服务的产物。^③ 因为经济制裁是人为干预导致的国际市场扭曲,会给发起国部分利益集团带来额外收益而对另一些集团造成损害,所以经济制裁决策通常是受益集团与受损集团竞相为“黑箱”输入政治资源后的均衡结果。^④ 埃琳娜·迈克林恩(Elena V. McLean)等认为,发起国出口导向型部门与目标国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出于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目的,发起国越倾向于采取定向制裁、削减援助等对目标国经济影响有限的制裁措施。^⑤ 吴限指出,常驻企业在美国国

① A. Cooper Drury, “Sanctions as Coercive Diplomacy: The U.S. President’s Decision to Initiate Economic Sanct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4, No. 3, 2001, pp. 485-508. 德鲁里后来的研究认为临近选举的在位总统不太愿意发起或修改制裁政策,因为担忧制裁引起竞选对手的政策抨击而影响选情。参见 A. Cooper Drury, *Economic Sanctions and Presidential Decisions: Models of Political Rational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81.

② Taehee Whang, “Playing to the Home Crowd? Symbolic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3, 2011, p. 789.

③ William H. Kaempfer and Anton D. Lowenberg,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 Public Choice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No. 4, 1988, p. 792.

④ Dennis Halcoussis et al., “The Public Choic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in Peter A. G. van Bergeijk ed., *Research Handbook on Economic Sanction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1, p. 154.

⑤ Elena V. McLean and Taehee Whang, “Designing Foreign Policy: Voters,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and Economic Sanc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1, No. 5, 2014, pp. 593-594.

内政治过程中的参与性权力与议价性权力是影响美国对华中间品制裁烈度的结构性限制因素。^①

3. 府会关系说

基于制度主义的法律化理论,府会关系说认为立法部门主导的经济制裁比行政部门主导的经济制裁强度更高。首先,立法部门实施制裁的方式是制裁立法,法律的正式性有助于解决制裁执行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难题,可有效减少私营企业的制裁规避行为;^②同时,经由立法部门发出的经济制裁是一个法律化、制度化较强的过程,法律化的制裁往往缺乏制裁灵活升降级的余地。^③其次,立法部门代表的社会利益通常更为广泛,导致立法部门具有维持现状的制度惰性。相比行政部门的经济制裁,立法制裁通常需要满足严苛的辩论、审议等程序性要求,这导致其面临较多制度性否决点的约束,所以有关解除制裁的动议更可能遭到要求延续制裁的议员否决。^④而且行政部门领导人通常需要对外交政策的负面结果负责,这使其在发起制裁方面比立法部门更加谨慎。^⑤最后,府会关系尤其是立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制度约束及其党派偏好也可能影响经济制裁强度。庞琴和郑娟指出,美国总统和议员具有区别于单一国家假定的精英自主性,这导致美国总统倾向于在中期选举年发起高强度制裁,而在大选年则主动降低制裁强度;同时,民主党议员偏好高强度贸易制裁,共和党更倾向低强度金融制裁。^⑥汉娜·

① 吴限:《突破价值链网络化制裁——企业结构性权力与中美中间品贸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8期,第81页。

② 有关法律化制裁的研究,参见 Victor A Ferguson, "Economic Lawfare: The Logic and Dynamics of Using Law to Exercise Economic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4, No. 3, 2022, pp. 1-30.

③ 迟志培、刘建伟:《经济制裁结束的政治逻辑》,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4期,第87—117页。

④ Emre Hatipoglu, "A Story of Institutional Misfit: Congress and US Economic Sanc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0, No. 4, 2014, p. 433.

⑤ Jordan Tama, "Forcing the President's Hand: How the US Congress Shapes Foreign Policy Through Sanctions Legislati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6, No. 3, 2020, p. 400.

⑥ 庞琴、郑娟:《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2期,第77—79页。

阿提亚(Hana Attia)也认为,当美国总统所在政党输掉中期选举而成为“跛足政府”时,由于推进国内政策议程的能力受阻,他们更倾向在其享有广泛自主权的经济制裁领域有所作为,但考虑到经济制裁对国内选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可能威胁其连任前景,总统更倾向在经济衰退期间发起低强度经济制裁。^①

(二) 双边关系视角

双边关系视角倾向于将经济制裁理解为危机谈判中的信号博弈工具,发起何种强度的经济制裁取决于制裁双方关系的性质及其变化,包括敌友关系说、民主制裁说与经济遏制说等。

1. 敌友关系说

基于联盟政治理论,敌友关系说认为发起国更偏好对盟友发起低强度制裁而对敌国发起高强度制裁。首先,由于敌友关系存在相对收益的零和性,一方占优就减损了另一方的相对安全感,因此对相对收益的争夺将促使发起国不断升级对敌对目标国的制裁强度。^② 其次,倘若发起国不对敌对目标国的“挑衅行为”做出高强度制裁回应,将有损本国在未来冲突谈判中的决心声誉,为此即便发起国明知制裁难以迫使敌国就范也要发起制裁。^③ 反之,由于盟友目标国预期未来不会频繁与发起国产生冲突,所以更倾向在制裁威胁期间或低强度制裁阶段做出让步,从而避免发生制裁僵局或高强度制裁。^④ 再次,发起国往往会在盟友目标国政权不稳期间减轻制裁强度,而在敌对目标国陷入政权不稳时对其发起高强度经济制裁,旨在进一步颠覆现政权并以解除制裁为条件扶植对己友好的政权,从而改善自身安全环境。^⑤ 最

① Hana Attia, “Divert When It Does Not Hurt: The Initia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by US Presidents from 1989 to 201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2, No. 1, 2024, p. 114.

② Daniel W. Drezner, *The Sanctions Paradox: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

③ Ibid., p. 5.

④ 庞琴:《冲突视角下的美国对外经济制裁——规范成本、相互依赖与制裁僵局》,第113—114页。

⑤ Elena V. McLean and Mitchell T. Radtke, “Political Relations, Leader Stability, and Economic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2, 2018, p. 358.

后,制裁中的敌友双方都希望通过承诺策略来向对手传递可信威胁从而提高本方的谈判优势,发起国倾向于诉诸国内观众成本来传递实施制裁的决心信号,目标国则倾向于采取寻租策略表明自身抵抗制裁的决心,这将导致双方长期处在维持制裁的政治收益高于经济成本的情境,陷入一种谁也不愿率先让步的制裁僵局。^①

2. 民主制裁说

借鉴“民主和平论”的研究,民主制裁说倾向于认为民主国家虽经常发起经济制裁,但是对同为民主政体的目标国的制裁强度往往较低且持续时间较短,而对非民主目标国的制裁强度较高且持续时间更长。首先,因为民主国家领导人寻求连任所需的“制胜联盟”规模较大,而经济制裁会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造成伤害,所以领导人既有发起经济制裁来满足国内部分群体的寻租动机,又有减少对其余群体造成经济损害的避险动机,导致民主国家领导人倾向于频繁发起低强度经济制裁来最大化连任所需的政治支持。^②其次,民主国家拥有类似的价值观,并倾向于将这些国内规范外化为民主“国际社会”的集体认同,出于这种认同,民主国家对待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会适用不同的行为规范,导致民主国家之间存在快速解决争端的机制,无须诉诸经济制裁乃至军事手段。^③最后,由于民主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较深,而经济制裁会对本国商业利益造成损害,所以发起国往往不愿对依存度较高的贸易伙伴发起经济制裁,即便形势所迫必须实施制裁,也会选择低强度制裁以避免经济冲突升级。^④

① Han Dorussen and Jongryn Mo, “Ending Economic Sanctions: Audience Costs and Rent-Seeking as Commitment Strateg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4, 2001, p. 411.

② David Lektzian and Mark Souva, “The Economic Peace between Democracies: Economic Sanctions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0, No. 6, 2003, p. 642.

③ Dan G. Cox and Drury A. Cooper, “Democratic Sanctions: Connec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and Economic Sanc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3, No. 6, 2006, p. 713.

④ Cullen F. Goenner, “Economic War and Democratic Peac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4, No. 3, 2007, p. 176.

3. 经济遏制说

基于霸权转移理论,经济遏制说关注霸权国以经济手段应对崛起国的挑战,认为霸权发起国实施何种强度的经济制裁取决于其遏制目标国的战略动机。迈克·马斯坦杜诺(Micheal Mastanduno)提出,为防止目标国军事实力迅速增长而构成战争威胁,发起国可分别采取“卡脖子”、战略禁运和战术联系等经济遏制策略削弱目标国的军事潜能。^① 黄琪轩认为,当国家面临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加剧时,会放松对合作者的技术管制,以“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而当合作者成为战略竞争者时,则会收紧相关管制。^② 宋国友和张纪腾指出,当前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策略之所以呈现出宽松和严格的差异,主要缘于美国对“中国威胁”的安全认知呈阶段性变化,以及美国对中美经贸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等因素的权衡。^③

(三) 外交决策视角

外交决策视角倾向于将经济制裁理解为国家的外交工具之一,通常假定国家作为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在给定的国际环境下对是否以及在何种强度上使用经济制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具体包括效用比较说、议题属性说和预期有效性说等。

1. 效用比较说

基于强制外交的理性决策理论,效用比较说认为发起国使用高强度经济制裁是为了避免采取代价更高的军事手段。戴维·鲍德温(David A. Baldwin)指出,作为国家领导人对外强制的工具之一,经济制裁是一种介于外交和武力之间且相互具有替代性的政策选择,是否发起经济制裁不仅要考虑制裁的成本收益,还应该比较制裁与其他替代性措施之间的成本收益。^④ 即便

① Michael Mastanduno, “Strategies of Economic Containment: U. S.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Vol. 37, No. 4, 1985, pp. 506-516.

② 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第94—120页。

③ 宋国友、张纪腾:《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3期,第8—15页。

④ 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New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0-14.

使用武力通常可以取得更好的预期收益,但由于发动战争的代价高昂,只要经济制裁的成本收益比高于使用武力,那么理性的国家领导人往往更倾向发起经济制裁来替代武力手段。^①

2. 议题属性说

基于安全化理论,议题属性说认为发起国领导人的对外制裁决策遵循适当性逻辑,发起国越重视争端议题的属性特质,就越愿意付出高昂代价来实施高强度经济制裁。^②一般来说,当发起国领导人面临威胁国家内部与外部安全、损害经济生存能力或国家尊严与威望的某种诱因(precipitant)时,往往会依据危机的重要性、解决争端的紧迫性和目标国的挑衅程度等因素决定是否发起经济制裁。^③但是,发起国的安全认知并非一以贯之,可能因领导人更迭或政党轮替而产生变化。弗洛里安·博勒(Florian Böller)等人认为,发起国决策者对争端议题违反国际规范的认知差异会影响其使用制裁的决心,2008年俄格冲突期间小布什仅将俄罗斯定性为“对民主价值的威胁”,而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奥巴马则把俄罗斯视作对“一般规则和国际法的威胁”,从而对俄罗斯采取了更强硬的经济制裁。^④

3. 预期有效性说

基于制裁有效性理论,预期有效性说认为制裁存在选择效应,发起国更倾向对容易让步的目标国使用制裁(且通常在威胁阶段成功),而不愿对明知难以让步的目标国发起制裁。^⑤佩克森·杜尔松(Peksen Dursun)等人发现,如果发起国评估目标国拥有第三方替代性市场来抵消经济制裁造成的

① David A. Baldwin, "The Sanctions Debate and the Logic of Choi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3, 2000, p. 85.

② Adrian U-Jin Ang and Dursun Peksen, "When Do Economic Sanctions Work? Asymmetric Perceptions, Issue Salience, and Outcom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0, No. 1, 2007, pp. 135-145.

③ A. Cooper Drury, *Economic Sanctions and Presidential Decisions: Models of Political Rational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69-70.

④ Florian Böller and Sebastian Werle, "Fencing the Bear? Explaining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n Intervention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7, No. 3, 2016, p. 330.

⑤ Irfan Nooruddin, "Modeling Selection Bias in Studies of Sanctions Efficac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1, 2002, pp. 68-69.

经济压力,那么理性的发起国通常从一开始就不愿发起经济制裁。^① 金桐俊(Kim Dong Jung)也认为,当目标国存在第三方经济伙伴能够替代因战略竞争而中断的经济关系时,发起国通常不会贸然发起经济制裁。^②

(四) 小结

总体来看,上述视角对发起国经济制裁强度差异问题作出了一些解释,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国内制度视角强调了国内政治行为体与制度结构的互动是发起国频繁使用象征性低强度经济制裁的主要原因,但对于为何经济制裁存在强度差异的问题往往语焉不详。双边关系视角指出了发起国对相对收益的关注是实施高强度制裁来打压目标国的主要动机,但仍存在难以区分究竟是敌友关系的变化导致制裁亦或是制裁引起关系变化的因果内生性问题。外交决策视角指出发起国对争议事件的安全认知与利弊权衡起着决定制裁强度的基础性作用,但由于未区分不同议题的经济制裁而难以解释相同议题下的制裁为何具有不同强度。鉴于此,本文首先构建一个测量经济制裁强度的指标,随后提出一个二阶段决策的需求-成本理论框架,最后进行案例分析,比较美国对俄罗斯在三次领土争端中的经济制裁强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二、经济制裁强度

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制裁强度的概念讨论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分别基于发起方、目标方和双方总和视角。基于发起方视角,刘建伟指出经济制裁强度可由制裁设计与执行过程中的全面性、普遍性和严格性等维度构成。^③ 基

① Peksen Dursun and Timothy M. Peterson, "Sanctions and Alternate Markets How Trade and Alliances Affect the Onset of Economic Coerc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9, No. 1, 2016, pp. 4-16.

② 复合遏制指的是军事与经济的协同遏制战略,参见 Kim Dong Jung, *A Reigning Power's Military-Economic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a Challenging Pow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p. 9.

③ 制裁内容涵盖范围越全面,参与实施制裁的国家数量越多,制裁制度执行越严格,则制裁强度越高。详见刘建伟:《国际制裁与国内结构变迁》,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页。

于目标国视角,理查德·康诺利(Richard Connolly)认为经济制裁强度等价于制裁影响(sanctions impact),可由经济制裁对目标国政治与经济格局造成影响的显著程度进行衡量。^①基于双方总和视角,庞琴将经济制裁强度界定为制裁造成的发起国经济成本和目标国经济损失的总和,由制裁政策设计和持续时间两个维度进行测量。^②

概念化反映研究者的问题指向,操作化则取决于实证意图。考虑到本文以发起国对外经济制裁的行为逻辑为研究取向,鉴此,本文将经济制裁强度界定为发起国对目标国实施的一系列旨在对目标国构成政治压力的经济制裁措施的强度。

那么,如何测量经济制裁措施的强度?帕特里克·韦伯(Patrick M. Weber)等人主张根据制裁措施的类型划分制裁强度,经济制裁强度可操作化为发起国与目标国制裁成本之积,其中制裁措施的成本由低到高分别为旅行禁令、定向金融制裁、武器禁运、援助制裁、贸易制裁和经济禁运,一旦发起国同时采用多项制裁措施,则以成本最高的制裁措施为准。^③卡塔利娜·梅斯纳(Katharina Meissner)等人进一步指出,经济制裁强度的测量指标不仅包括制裁的措施类型,也包括制裁措施的影响范围,即制裁措施的歧视性,从最具歧视性到最不具歧视性的影响范围分别为自然人、法人、产品、行业与全部人口。^④

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L.

① 康诺利对制裁强度的讨论侧重于“制裁影响”(sanctions impact),参见 Richard Connolly, *Russia's Response to Sanctions: How Western Economic Statecraft is Reshap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0.

② 庞琴:《冲突视角下的美国对外经济制裁——规范成本、相互依赖与制裁僵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期,第113—114页;庞琴、郑娟:《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研究》,第43—44页。

③ Patrick M. Weber and Gerald Schneider, "Post-Cold War Sanctioning by the EU, the UN, and the US: Introducing the EUSANCT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39, No. 1, 2022, pp. 97-114.

④ Katharina Meissner and Chiara Graziani,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sign of EU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Russia,"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5, No. 3, 2023, pp. 377-394.

Newman)在对“相互依赖武器化”的类型学研究中指出,经济胁迫的渠道(channel)与对象(target)的交互构成了经济胁迫的不同变体。^① 尽管法雷尔等人的研究并未直接讨论制裁强度,但他们提出的相互依赖武器化类型划分有助于理解制裁强度。鉴于此,本文根据经济制裁的对象范围和经济制裁的权力手段两个维度,构建一个衡量经济制裁强度的定性标准。

一是经济制裁的对象范围,主要评估经济制裁措施的全面性,即经济制裁的负面影响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覆盖目标国的全体国民。该维度将经济制裁的对象范围划分为国家与非国家两类。前者是针对国家的全面制裁(comprehensive sanctions),即发起国切断与目标国的绝大部分经济联系;后者是针对非国家实体的定向制裁(target sanctions),即发起国选择性地切断与目标国的特定个人、实体或组织的部分经济联系。

二是经济制裁的权力手段,主要评估经济制裁措施的权力类型,尤其是发起国是否利用本国节点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和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带来的位置优势对目标国节点实施网络化制裁。^② 这一维度可将经济制裁的权力手段划分为网络性与双边性。凭借网络性权力发起的经济制裁通常具有网络效应,能够对目标国形成立体化、全方位的经济孤立;相比之下,凭借双边性权力发起的经济制裁则经由非对称的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发挥作用,目标国更容易通过寻找替代性经济伙伴来破解发起国的经济制裁。

选择这两个维度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这两个维度分别从发起国与目标国的视角出发,讨论了目标国受影响的主体特质以及制裁国施加影响的权力类型,能够更全面地评估经济制裁强度。二是这两个维度兼顾了制裁的发起与执行阶段,其中权力手段可将双方“制裁-反制裁”的策略互动尤

①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and Networked Coercion: A Research Agenda,” in Daniel W. Drezner et al., eds., *The Uses and Abuses of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1, p. 309.

② Hafner-Burton Emilie, Miles Kahler and Alexander Montgomery,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 3, 2009, pp. 563-564.

其是发起国使用次级制裁的执行过程纳入制裁强度的评估。三是这两个维度相互独立且正交,满足一般社会科学对于类型学划分的基本要求。^① 根据以上两个维度,可以将经济制裁强度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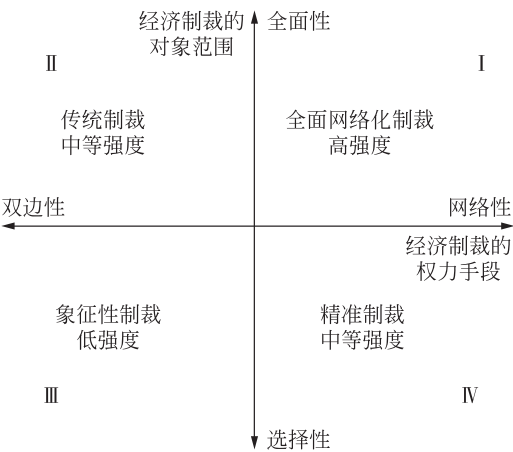


图 1 经济制裁的强度划分

资料来源: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and Networked Coercion: A Research Agenda,” p. 309.

第一象限展示了发起国利用网络性权力、对象范围涉及目标国全体国民的高强度网络化制裁。任琳和孙振民指出,所谓网络性权力是指霸权国利用网络结构的不对称控制节点与连线的能力,从而将崛起国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② 吴限认为,主导国对于任意第三方节点皆具有强制性权力,一旦借此切断网络中所有指向目标国的连接,便能构成新型网络化制裁。^③ 与传统经济制裁相比,网络化制裁通过减少目标国寻得替代性第三方经济伙伴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增强了目标国面临的经济孤立局面。一般而

① 赵鼎新:《推理和社会学——理想型集方法的运用和发展》,载《社会学评论》,2023 年第 1 期,第 18—38 页。
② 任琳、孙振民:《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6 期,第 83 页。
③ 吴限:《新型网络化制裁的结构性限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11 期,第 136 页。

言,制裁发起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提高制裁的网络化程度。^① 一是利用网络性权力实现相互依赖武器化。大国凭借本国货币与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将其国内规则与司法管辖权扩张至域外,进而控制管辖范围内的金融中介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用以推进本国的政治与安全目标。^② 法雷尔和纽曼据此提出了武器化相互依赖理论:对全球经济网络中心节点拥有管辖权的国家,可以利用“阻塞效应”(choke point effect),切断他对国际支付与结算体系的使用权限,禁止其与网络内任一节点的经济连结,从而实现网络化制裁的战略目标。^③ 二是提高多边制裁的国际合作水平。丽萨·马丁(Lisa Martin)指出,当制裁发起国与第三方的制裁偏好基本一致又存有分歧时,发起国可通过释出昂贵的制裁信号向第三方盟友提供可信承诺,并诉诸国际制度的议题联系来提高经济制裁的多边合作程度。^④ 研究表明,当多边经济制裁诉诸国际制度,参与的成员国数量越多,且成员国与目标国的经贸联系越紧密,多边经济制裁联盟就越能造成目标国的经济孤立局面并胁迫目标国做出让步。^⑤ 三是域外管辖的次级制裁视角。由于制裁发起国掌握全球经济网络的中心节点地位,通过实施“长臂管辖”,既可以间接改变第三方经济体与目标国开展交易的风险预期,使其产生寒蝉效应而自发加入制裁阵

① 网络效应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即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中心节点的网络性权力越强,另见朱杰进、胡馨予:《网络效应、融入程度与国际制度遵从》,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4期,第95页。

② Daniel W. Drezner, *All Politics Is Global: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Regim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

③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55-56.

④ Lisa L. Martin, *Coercive Cooperation: Explaining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10.

⑤ Navin A. Bapat and T. Clifton Morgan, "Multilateral Versus Unilateral Sanctions Reconsidered: A Test Using New Dat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3, No. 4, 2009, p. 1077; McLean V. Elena and Taehee Whang, "Friends or Foe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2, 2010, p. 432; 熊谦、田野:《国际合作的法律化与金融制裁的有效性:解释伊朗核问题的演变》,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第104页。

营;^①也可采取次级制裁,惩罚与目标国开展交易的第三方行为体,直接阻断目标国参与既有经济网络的机会。^②

第二象限呈现的是发起国凭借双边性权力、对象范围涉及目标国全体国民的传统经济制裁。该形式通常表现为发起国单方面切断与目标国的绝大部分经贸联系。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最早指出,经济实力更强大的德国与周边小国的贸易联系是其得以利用后者缺乏“退出选择”以实现政治控制的主要途径。^③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进一步指出,在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中脆弱性与敏感性较小的一方有余地促动变化或以变化相威胁,诱使对方在某个议题领域做出政治让步。^④ 但是,这一制裁形式常被诟病有效性不佳且易造成人道主义危机。^⑤ 在有效性上,基于双边相互依赖的经济制裁并未限制目标国与第三方替代性经济伙伴的经济联系,而第三国政府与私营企业往往出于政治或经济动机,通过提供援助或深化贸易合作等方式帮助目标国减轻制裁的负面影响。^⑥ 在人道主义上,传统经济制裁虽然能够对目标国造成较高的整体经济损失,

① Juan Zarate, “Harnessing the Financial Furies: Smart Financial Power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2, No. 4, 2009, p. 45; Timothy M. Peterson, “Sanctions and Third-party Compliance with US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An Analysis of Dual-use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5, No. 10, 2021, p. 1823.

② Early R. Bryan and Keith Preble, “Going Fishing versus Hunting Whales: Explaining Changes in How the U. S. Enforces Economic Sanctions,” *Security Studies*, Vol. 29, No. 2, 2020, p. 34; 戚凯:《霸权羁缚: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长臂管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8—134页。

③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5, p. 17.

④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⑤ Johan Galtung, “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With Examples from the Case of Rhodesia,”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3, 1967, p. 409; 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27页。

⑥ Bryan R. Early, *Busted Sanctions: Explaining Why Economic Sanctions fail*. Stanford, California, U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1; 方炯升:《何种经济反制措施更具效能?——以欧盟对美反制为案例的考察》,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4期,第35页。

但国内政治分配效应使得制裁的经济成本往往非对称地导致普通平民受损,而掌握内政外交决策权的统治者及其执政联盟却能够置身事外。^①因此,这一传统制裁形式在西方国家对外制裁实践中逐步被新型网络化制裁所取代。^②

第三象限展示了利用双边性权力、对象范围涉及目标国部分国民的低强度象征性制裁。在对象范围上,象征性制裁不以影响目标国全体国民为目的,而是对目标国相关政策负有责任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个人、实体或企业发起的选择性经济制裁。^③比如,针对个人的旅行禁令与境内资产冻结等措施往往因歧视性较高而被视作一种缺乏强制力的象征性经济制裁。^④在权力手段上,因为基于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发起的选择性制裁是切断制裁双方特定经济部门的联系,通常不对目标国与经济网络中的任意第三方构成限制,所以被制裁对象往往可以凭借诸如市场再分配、贸易偏转或产业转型等自发性经济调整机制或反制裁措施来降低自身脆弱性(适应制裁环境)。^⑤例如,在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所引发的中国对日稀土出口管制中,尽管日本对中国稀土出口存在较高的非对称依赖,但因为基于双边经济权力的定向制裁并未对第三方经济行为施加任何限制,所以日本能够较快地通过实

① Daniel W. Drezner, "Targeted Sanction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41, No. 4, 2015, p. 759.

② 刘建伟:《美国次级经济制裁:发展趋势与常用对策》,载《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第145—148页。

③ 刘建伟:《经济制裁:一项国际比较研究》,第5页。有研究指出,切断援助也属于精准制裁,并认为切断援助型制裁的有效性较高。参见 Jeong Jin Mun, "Do Sanction Types Affect the Dura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The Case of Foreign Ai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0, No. 2, 2018, p. 235. 本文认为,由于大国援助通常流向盟友而非对手,对受援国而言,来自盟友的援助难以通常难以快速找到替代性第三方援助者,因此来自援助国的制裁通常具有较高的网络性权力。

④ Katharina Meissner and Chiara Graziani,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sign of EU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Russia," pp. 377-394.

⑤ Victor A. Ferguson, Scott Waldron and Darren J. Lim, "Market Adjustments to Import Sanctions: Lessons from Chinese Restrictions on Australian Trade, 2020—21,"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30, No. 4, 2022, pp. 1255-1281.

施稀土供应链多元化政策来缓解经济损失。^①

第四象限呈现的是利用网络性权力、对象范围涉及目标国部分国民的中等强度精准制裁。在对象范围上,与高强度网络化制裁相比,精准制裁只对部分个人或企业产生影响,因而强度有所下降;在权力手段上,如果发起国掌控诸如市场、资源或技术等权力要素,^②往往可以通过货币武器化、多边合作与“长臂管辖”等渠道将经济制裁的权力手段转化为网络性,从而大幅度提升制裁强度。例如,冷战期间,为防止苏联经济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军用潜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不仅管控本国企业与苏联的科技品贸易,同时利用自身的联盟影响力构建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西欧等第三方国家与苏联的正常贸易。^③ 无独有偶,自中美战略竞争以来,美国不仅禁止华为等企业赴美投资,而且极力拉拢第三方国家构建旨在遏制中国半导体技术发展的出口管制联盟,以及针对华为 5G 技术发起市场准入限制等。^④ 关于经济制裁强度的类型、措施与典型案例,详见表 1。

表 1 制裁类型、措施及其代表性案例

制裁类型	一般措施	强度	案例
全面网络化制裁	多边经济制裁;冻结外汇储备;SWIFT 制裁	高强度	2010 年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传统制裁	单边经济制裁	中等强度	1962 年美国对古巴经济禁运
象征性制裁	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单边贸易制裁	低强度	2020 年美国以“香港问题”为由发起的经济制裁
精准制裁	多边贸易制裁;切断援助;限制金融交易	中等强度	2020 年以来美国对华半导体行业的经济制裁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Eugene Gholz and Llewelyn Hughes,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anctions: The 2010 Rare Earth Elements Episode as a Pathway Case of Market Adjust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8, No. 3, 2021, pp. 611-634.

② 李巍、李屿译:《解析美国对华为的战争——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载《当代亚太》,2021 年第 1 期,第 8 页;孙成昊等:《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机制探析——权力来源与政策实践》,载《欧洲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75—76 页。

③ 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 Containment: CoCom and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Trad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3-34.

④ 孙学峰、张希坤:《美国盟国华为 5G 政策的政治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6 期,第 110—137 页。

为什么制裁发起国的对外经济制裁会出现不同的强度差异?通过借鉴决心-成本平衡理论,本文认为,发起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及其对反噬成本的考量共同影响了经济制裁的形式选择及其强度差异。

三、经济制裁强度的需求-成本理论

(一) 发起制裁的声誉需求

发起国决定采取何种强度的制裁措施与发起国借此彰显决心的需求高度相关。^① 声誉需求本是国际冲突研究中的延伸概念,强调国家通过发动战争的方式来建立决心声誉(reputation for resolve)的动机大小。一般认为,声誉是一国通过观察他国过去行为而形成的关于他国特征与行为模式的认知,决心声誉则是一国面对挑衅而坚持不让步所形成的战略信誉。^② 例如,卡伦·亚希米洛(Keren Yarhi-Milo)认为,与低度“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型领导人相比,高度“自我监控”型领导人更倾向于主动采取高成本、高风险的军事行动来建立一种坚韧而强硬的决心声誉,以便在未来的冲突中享有谈判优势。^③

① Ketian Zhang, “Cautious Bully: Reputation, Resolve, and Beijing’s Use of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117-159. 需要说明的是,决心-成本平衡理论讨论的是展示决心的动机,但由于决心信号主流议程通常关注决心信号的可信度问题,并将可信度与信号成本挂钩,因此在概念表述上可能产生误解。作者感谢外交学院吴文成老师指出这一点。关于决心信号有效性的研究,另见尹继武:《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5期,第1—24页;吴文成:《成本调节与外交危机中的决心信号表达》,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4期,第1—52页。

② 李冲、漆海霞:《盟主国声誉、安全依赖与冲突爆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2期,第32页。关于声誉(reputation)、决心声誉(reputations for resolve)和战略信誉(strategic credibility)的概念辨析,另见漆海霞:《崛起信号、战略信誉与遏制战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4期,第9—10页。

③ 自我监控是心理学概念,亚希米洛将其引入国际政治研究,认为高自我监控型领导人更关心决心声誉的形成和维护。参见 Keren Yarhi-Milo, *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1-14.

张可天(Ketian Zhang)将“声誉需求”概念应用至强制外交研究,并提出一个“决心-成本平衡”(resolve cost balancing)理论用以解释崛起国的强制外交策略选择。她将崛起国的强制外交策略选择由弱到强划分为外交制裁、经济制裁、灰区胁迫和武力威胁,并假定崛起国的强制行为会反噬国内经济增长。因此,当建立决心声誉的需求较高而经济成本有限时,崛起国更可能发起对外强制;当建立决心声誉的需求较高但经济成本也较高时,崛起国往往只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议题领域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如果强硬行为可能招致域外霸权的军事介入,那么崛起国通常会选择低强度的经济、外交制裁或灰区胁迫;反之,崛起国则只会在霸权介入的地缘风险较低时才采取诸如军事演习等更强硬的胁迫手段。^①

尽管张可天关注的是崛起国开展强制外交的决策行为,但这一因果逻辑同样可以应用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发起逻辑,尤其是在大国无战争与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复杂化的时代。具体而言,当出现某种被发起国视为诱因(precipitant)的国际危机事件时,发起国如果不“做点什么”,那么将面临国内选民和盟友的观众成本惩罚,甚至可能会遭到挑衅对象和第三方敌国在未来发出的更多类似挑衅。此时,为了确保国内选民的支持和盟友的信任并威慑潜在的类似挑衅行为,发起国倾向于对目标国实施经济制裁,来建立、维护或提高自身的决心声誉。^②

如何测量发起国的声誉需求?张可天用“潜在的挑战者数量及其重要性”和“相关议题的国际媒体报道数量”作为测量标准判断特定事件中发起国的声誉需求高低。例如,在2000—2006年,菲律宾等国减少了对中国南海主权的侵犯行为,且国际媒体的报道数量较低,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建立决心声誉的需求较低;然而,自2007年以来,菲律宾等国开始在中国南海地区持

① Ketian Zhang, *China's Gambit: The Calculus of Coerc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p. 30.

② 需要指出的是,本理论框架的隐含前提是国家、领导人“往往痴迷于他们的……声誉”,参见 Allan Dafoe, Jonathan Renshon and Paul Huth, “Reputation and Status as Motives for Wa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 No. 1, 2014, p. 381, 虽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声誉对领导人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不存在,另见 Shiping Tang,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2005, pp. 34-62.

续进行石油勘探活动,国际媒体对相关争端事件的报道数量也急剧增长,这使得中国通过采取强制外交来建立决心声誉的需求有所提高。^①

对作为霸权的发起国而言,经济制裁是比战争成本更低的替代性选项。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测量发起国声誉需求的三个维度^②:第一,发起国是否认为目标国的行为对自身构成了安全威胁;第二,发起国国内媒体是否对相关诱因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第三,决策者是否判断未来可能持续发生类似事件。换言之,如果发起国认为目标国对自身构成了安全威胁,其国内媒体对相关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且决策者判断未来可能持续发生类似事件,这种情况下发起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

发起制裁的声誉需求如何影响经济制裁的强度选择?首先,感知到安全威胁的发起国会受恐惧机制驱动而倾向于产生更大的建立决心声誉的需求。正如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指出的那样,当恐惧成为主要的行为动机时,国家会因模糊掉损失-收益的框定界限,变得要么倾向更大的风险接受(制衡与先发制人),要么倾向更多的风险规避(妥协或追随大国)。^③马斯坦杜诺也认为,当美国对国际环境的恐惧占主导时,会更频繁地把经济相互依赖武器化,以追求更为紧迫的安全目标。^④

其次,国内媒体对国际危机的密集报道会增加选民对事件显著性的认知,^⑤

① Ketian Zhang, *China's Gambit: The Calculus of Coercion*, pp. 54-61.

② 尽管美国国会可以通过立法参与对外经济制裁,但美国在应对即时性危机中的制裁决策通常由总统及其行政团队做出。根据“谁影响力越大,谁的声誉最重要”(influence-specific reputations)理论,本文假定发起制裁的声誉需求主体为总统及其行政团体。参见 Jonathan Renshon, Allan Dafoe and Paul Huth, “Leader Influence and Reputation Formation in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2, No. 2, 2018, pp. 325-339.

③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67.

④ Michael Mastanduno, “Hegemony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Determinants of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Daniel W. Drezner et al., eds., *The Uses and Abuses of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1, pp. 67-83.

⑤ 有关自由媒体与观众成本生产机制的研究,参见 Branislav L. Slantchev, “Politicians, the Media, and Domestic Audience Co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2, 2006, p. 468.

从而对领导人产生观众成本并增强其发起制裁以建立决心声誉的需求。研究发现,选民对国际危机事件的国内辩论越充分、信息透明度越高,且形势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确信性越强,对领导人施加的观众成本越大,就越可能激励政府对外展示决心。^① 黄泰熙也指出,美国总统经常为寻求国内选民的政治支持而发起经济制裁,而且只要总统对制裁展现出了强硬决心,那么即便制裁无助于改变目标国行为,也能够提升总统的国内形象。^②

最后,决策者判断未来可能持续发生类似事件将触发威慑机制,从而产生更高的建立决心声誉的需求。谢林指出,因为战略威慑是一种对冲突双方均代价高昂的行为,所以发起方必须表现出自己贯彻威胁的决心,而不只是可能性。^③ 研究认为经济制裁也存在类似逻辑,尤其是发起高强度的经济制裁可对国际体系内的第三方国家传递可信威胁,从而减少发起国未来遭受类似挑战的风险。^④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成为发起国建立决心声誉以便发出可信威慑的对象。如果一个国家出于建立决心声誉的目的而发起制裁,那么它发出可信威胁所针对的对象往往是未来会与之发生冲突的潜在对手,既可能是直接威胁的目标国,也可能是间接威胁的第三方国家。^⑤ 尼古拉斯·米勒(Nicholas Miller)的研究发现,美国的反核扩散制裁不仅针对正在进行核试验的目标国,也起到了向其他想要进行核试验的国家传递威胁信号的作用,迫使其放弃未来可能的拥核计划。^⑥

图2显示了经济制裁声誉需求的测量指标及其因果机制的相关内容。

① Alexandre Debs and Jessica Chen Weiss, "Circumstances, Domestic Audiences, and Reputational Incentives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Bargain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0, No. 3, 2016, pp. 425-426.

② Taehee Whang, "Playing to the Home Crowd? Symbolic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p. 789.

③ 托马斯·谢林著、赵华等译:《冲突的战略》,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

④ Timothy M. Peterson, "Sending a Message: The Reputation Effect of US Sanction Threat Behavi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7, No. 4, 2013, p. 675.

⑤ Joe Clare and Vesna Danilovic, "Multiple Audiences and Reputation 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6, 2010, p. 866.

⑥ Nicholas L. Miller, "The Secret Success of Nonproliferation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4, 2014, p. 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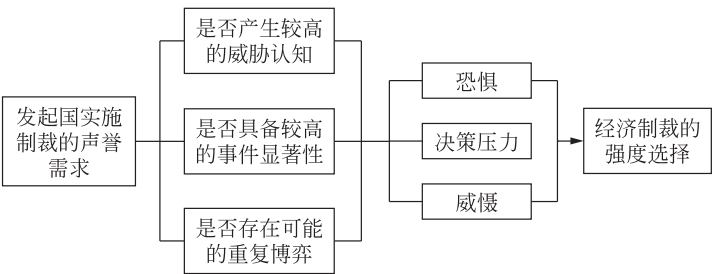


图2 经济制裁声誉需求的因果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发起国的声誉需求对于经济制裁具有驱动性影响。与此同时，发起国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会对经济制裁的形式及其强度产生限制性影响。

（二）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

作为对外制裁决策的第一阶段变量，发起制裁的声誉需求会直接影响发起国对经济制裁的形式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作为决策第二阶段变量，以此探究经济制裁的限制因素对发起国制裁决策的影响。^① 一般来说，如果经济制裁不产生任何成本，那么发起国通常倾向于采取最高强度的经济制裁形式。但是，发起国实施经济制裁通常会导致目标国的报复性反制，包括外交关系降级、WTO 上诉与反制裁，乃至组建军事联盟制衡发起国。因此，即便制裁发起国具备较高的声誉需求，他们对反噬成本的预先评估也会成为制裁形式设计的约束性因素。

就高强度的网络化制裁而言，网络结构的耗散性特征是发起国动用此种制裁形式的主要限制。法雷尔和纽曼指出，如果网络结构中的主导国不加节制地使用相互依赖武器化，将刺激潜在目标国发展替代性网络来降低主导国的网络性权力。^② 丹尼尔·麦克道尔 (Daniel McDowell) 认为，美国

① 本文分析框架可以理解为一个二阶段决策模型，声誉需求处于制裁“发起”阶段，反噬成本处于制裁“实施”阶段。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这一点。

②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p. 78.

滥用金融制裁的行为会引发潜在目标国对于使用美元的政治风险意识,进而刺激更多国家寻求去美元化并最终降低美国金融武器化的效果。^①任琳和孙振民指出,霸权国对他国滥用“长臂管辖”会产生霸权侵蚀效应,从而破坏其网络性权力的知识、物理和法理基础。^②吴限通过分析货币金融网络和半导体技术网络的案例,发现美国对结构变化速率较快的金融网络化制裁表现出克制和谨慎,但在结构演变速率较慢的半导体技术方面则频繁和激烈地使用网络化制裁。^③

鉴于网络化制裁的高强度特征,本文提出两个测量发起国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的新维度:处在网络结构中心节点的第三方国家是否支持高强度经济制裁,以及发起国与目标国整体经济联系的深浅程度。位于中心节点的第三国越愿意配合发起国实施高强度制裁,且发起国与目标国的整体经济联系较浅,则发起国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就越低;反之,位于中心节点的第三国越不愿配合发起国实施高强度制裁,且发起国与目标国的整体经济联系较深,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就越高。

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制裁的强度差异?基于经济相互依赖与网络复杂性理论,本文从经济反制和网络结构演变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经济反制是指目标国利用经济相互依赖对发起国实施自我保护或回击的惩罚性反制裁措施。^④网络结构演变是指第三方节点因发起国使用经济制裁而产生推动网络发生系统演变的去风险行为。^⑤

① Daniel McDowell, “Financial Sanctions and Political Risk in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8, No. 3, 2020, p. 640.

② 任琳、孙振民:《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第90页。

③ 吴限:《新型网络化制裁的结构性限制》,第132—158页。

④ Masha Hedberg, “The Target Strikes Back: Explaining Countersanctions and Russia’s Strategy of Differentiated Retaliation,” *Post-Soviet Affairs*, Vol. 34, No. 1, 2018, pp. 35-54;方炯升:《何种经济反制措施更具效能?——以欧盟对美反制为案例的考察》,第23—50页。

⑤ Thomas Oatley,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No. 4, 2019, pp. 957-978.

当发起国与目标国的整体经济联系程度较浅,短期内遭受目标国经济反制的影响越小,且实施制裁得到较多中心节点国支持时,长期来看网络结构朝向“去中心”的演化速率也越慢,此时发起国采取高强度经济制裁的掣肘因素就越少;反之,当发起国与目标国的整体经济联系程度较深,短期内遭受目标国经济反制的影响越大,且实施制裁得到较少中心节点国支持时,长期来看网络结构朝向“去中心”的演化速率也越快,此时发起国采取高强度经济制裁的掣肘因素就越多。图3显示了经济制裁反噬成本的测量指标及其因果机制的相关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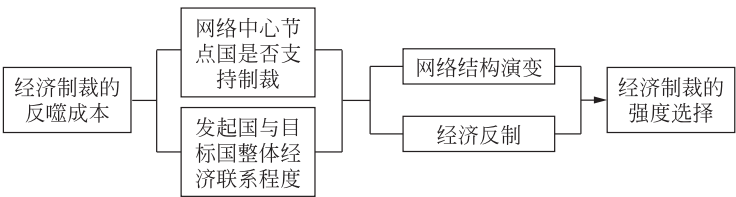


图3 经济制裁反噬成本的因果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 理论框架

本文以发起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和反噬成本为自变量,以经济制裁强度为因变量,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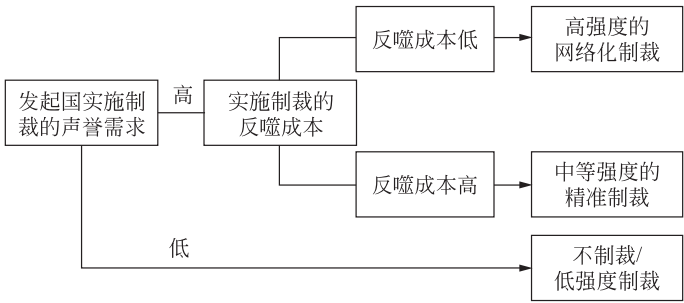


图4 经济制裁强度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经济制裁强度的理论框架中,本文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说。

假说 1: 当发起国实施制裁的声誉需求较低时,发起国倾向于不制裁或低强度制裁。

假说 2: 当发起国实施制裁声誉需求较高且制裁的反噬成本也较高时,发起国倾向于发起中等强度精准制裁。

假说 3: 当发起国实施制裁声誉需求较高但制裁的反噬成本较低时,发起国倾向于发起高强度全面制裁。

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基于“最具相似性”案例设计,选取美国三次对俄罗斯发起经济制裁的案例,并采取过程追踪法来验证案例间的结果差异是否缘于理论预测的自变量变化,而非案例间不可控的残余差异(比如美国领导人的变更)。^① 2008 年俄格冲突期间,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了低强度经济制裁;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美国持续升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但始终没有采取高强度经济制裁形式;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迅速对俄罗斯发起了高强度经济制裁。

选择这三个案例的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能够较好地控制发起国与目标国的双边关系类型。这三个案例的主要当事方都是美国和俄罗斯,且事件发生前双边关系的总体变化较小,双方既非盟友关系也并未处于全面对抗状态。第二,便于控制经济制裁的诱因和事件类型。这三个案例的起因都是俄罗斯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且都是美国旨在通过强制外交打击俄罗斯军事冒险行为,从而减少不同事件类型间不可比性的质疑(比如防止核扩散与促进人权通常具有不同程度的制裁动因)。第三,便于控制时间和制裁能力变量。虽然网络化制裁形式早已有之,但美国动用 SWFIT 对别国发起高强度制裁还是在“九一一”事件以及因伊核问题对伊朗实施制裁后,才得以发展成熟。在这三个案例发生的时段内,美国都有能力对俄罗斯发起高强度的网络化制裁。

^① Andrew Bennett and Colin Elman, “Case Study Method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bfiel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07, pp. 174-176.

四、比较案例分析

(一) 俄格冲突：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低强度经济制裁

1. 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低强度经济制裁

2008年8月8日,俄格冲突爆发时,正在出席北京奥运会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表声明,要求双方立即停火,尤其敦促俄罗斯停止轰炸,尊重格鲁吉亚的主权与领土完整;^①8月11日,回到华盛顿的小布什听取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通过外交沟通渠道要求俄罗斯恢复战争爆发前南奥塞梯地区现状;^②8月12日,在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斡旋下,俄格双方达成原则性的六点停火协议;8月13日,小布什决定派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前往格鲁吉亚观察局势,并协助法国参与斡旋;^③8月2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案,正式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两地独立,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破坏格鲁吉亚的领土主权。^④小布什没有发布行政命令授权对俄发起法律化经济制裁,而是采取了两项较为隐蔽的低强度经济制裁:一是暂停美俄WTO谈判;^⑤二是撤回提交国会审议的《美俄民

①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ush Concerned by Escalation of Violence in Georgia,” August 9, 2008,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8/08/20080809-2.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②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Situation in Georgia,” August 11, 2008,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8/08/20080811-1.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③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Situation in Georgia, Urges Russia to Cease Military Operations,” August 13, 2008,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8/08/20080813.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④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ush Condemns Actions Taken by Russian President in Regards to Georgia,” August 26, 2008,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8/08/20080826-2.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⑤ 《俄第一副总理:美国打算阻挠俄罗斯加入WTO》,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08年8月25日, <https://sputniknews.cn/20080825/42246509.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用核能合作协议》，作为对“俄罗斯破坏格鲁吉亚主权与民主”的回应。^①

为什么该制裁被评估为低强度象征性制裁？一方面，这两项制裁措施没有直接指定任何俄罗斯公民，只对间接从事相关领域的经济部门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主要运用双边性权力而非网络性权力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体现在美国仅暂停本国与俄罗斯的入世谈判进程，没有运用其强大的外交政策影响力来阻碍其他 WTO 成员与俄罗斯的正常谈判；同时，对于俄罗斯从欧洲、日本等国进口替代性核材料的行为，美国也没有利用自身的经济金融霸权强制第三方盟友加强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②

为什么在 2008 年俄格冲突期间美国选择对俄罗斯实施低强度经济制裁？根据经济制裁强度的理论框架，我们首先从美国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方面进行分析。

2. 美国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低

2008 年俄格冲突爆发初期，美国主要采取外交斡旋的策略，直到俄罗斯正式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独立后才对俄罗斯发起了象征性的低强度经济制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首先是美国建立决心声誉的需求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并未将俄罗斯本次军事行动视作严重的安全威胁；二是美国正陷入金融危机，国内公众对俄格冲突的关注度不高；三是美国此时没有通过制裁发出威慑信号的潜在对象。

第一，美国尚处于单极霸权的巅峰时刻，未对俄罗斯的行为感受到安全威胁，这一点集中体现于美国的大战略讨论。^③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作为唯一一个在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科技和文化等各个权力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影响力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④ 美国战略界认为，“9·11”之前，对于如何认定美国的国家利益、识别安全威胁，争议不断，但“9·11”事

① “The U. S. -Russian Agreement for Peaceful Nuclear Cooperation,” June 21, 2010, <https://www.nti.org/analysis/articles/us-russian-peaceful-cooperation/>,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20 日。

② “Why Russia Supported Sanctions Against Iran,” June 23, 2010, <https://nonproliferation.org/why-russia-supported-sanctions-against-iran/>,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20 日。

③ 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载《当代亚太》,2018 年第 4 期,第 35 页。

④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1999, p. 36.

件消除了美国在大战略选择上的迷茫,恐怖主义成为美国评估安全威胁以及制定大战略的核心目标。^①俄格冲突期间,尽管大国崛起已经引起美战略精英的注意,但小布什政府仍然以反恐战争作为其战略重心。^②此外,由于打击恐怖主义符合包括俄美在内的各国利益,事实上促进了大国之间的相互合作,正如伊肯伯里所言,“当前国际秩序的最重要特征是大国之间不存在战略对抗和竞争制衡。”^③

第二,小布什政府专注于应对金融危机,并未将俄格冲突视作优先事项。如图5所示,在冲突爆发的8月份,美国国内三大主流媒体对俄格冲突的报道数量皆不到100,不足以刺激美国总统为回应国内舆论压力而对俄罗斯采取强硬外交措施。同时,虽然格鲁吉亚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但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性质和目标均有限,降低了美国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回应的必要性。此外,由于俄格冲突持续时间较短,美国并未对军事占优的俄罗斯发出制裁威胁,因而未能产生约束小布什政府的观众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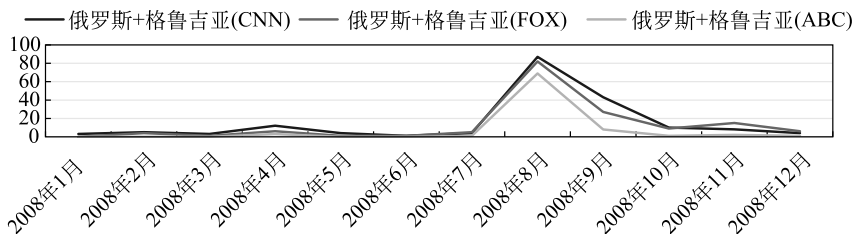


图5 美国CNN、FOX和ABC涵盖“俄罗斯+格鲁吉亚”的媒体报道数(2008年)

资料来源: Lexis Advance, <https://www.lexisnexis.ca/en-ca/products/lexis-advance-quicklaw-overview.page>。

第三,美国缺乏潜在威慑目标并认为俄罗斯未来不会继续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冷战后俄罗斯一直在试图融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际秩序,并按照西方标准对本国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进行根本改造。1997年,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G8成员国,同时,俄罗斯积极与美国在反恐等低政治领

① 赵明昊:《迈向“战略克制”?——“9·11”事件以来美国国内有关大战略的论争》,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3期,第135页。

② 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第35页。

③ John G. Ikenberry,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error,” *Survival*, Vol. 43, No. 4, 2001, p. 21.

域开展广泛合作,并表态愿意加入北约和 WTO 等国际组织。冲突爆发后,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谈及俄美关系时表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寻求并支持一个强大、繁荣和负责任的俄罗斯的崛起,美国没有将俄罗斯视为已被击败的敌人,而是将其视为新兴伙伴。”^①梅德韦杰夫在 9 月 3 日也表示,俄罗斯和西方存在着广泛的依赖关系,俄不愿意与西方为敌。^②直至 2011 年,美国战略界仍认为,美国应寻求与俄罗斯建立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以促进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③正如基辛格在 2018 年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西方在普京兼并克里米亚之前的几年里错误地认为俄罗斯将采用西方基于规则的秩序,北约误读了俄罗斯对尊重的根深蒂固的渴望。”^④

总之,俄格冲突期间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低,这使得小布什政府并未对俄罗斯发起正式经济制裁,仅采取了两项非正式经济制裁措施。这表明,本文假说 1(发起国实施制裁的声誉需求较低时,发起国倾向于不制裁或低强度制裁)提出的理论假说与经验事实一致。

(二) 克里米亚事件: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中等强度经济制裁

1. 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中等强度经济制裁

克里米亚事件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经历了从低强度到中等强度的升级过程。

第一阶段是针对克里米亚公投以及俄罗斯正式兼并克里米亚而发起的“克里米亚制裁”。2014 年 3 月 6 日,在俄罗斯特种部队进入克里米亚政府大楼约一周、克里米亚议会决定于本月 16 日举行入俄公投之际,奥巴马签署第 13660 号行政令,认定克里米亚事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构成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Rice Addresses U. S. -Russia Relations at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September 18, 2008, <https://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rm/2008/09/109954.htm>,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20 日。

② 朱锋:《俄格冲突的国际政治解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11 期,第 9 页。

③ Graham Allison and Robert D. Blackwill, “Russia and U. S. National Interests,” Task Force on Russia and U. S. National Interests Report, October 2011, p. 8.

④ Edward Luce, “Henry Kissinger: ‘We Are in a Very, Very Grave Period’,” July 20,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926a66b0-8b49-11e8-bf9e-8771d5404543>,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20 日。

了非同寻常和特殊的威胁”，宣布将对“破坏乌克兰民主进程和机构”或“挪用乌克兰公共资产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① 该命令并未直接发布制裁名单，而是授权美财政部部长雅克布·卢(Jacob J. Lew)与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协商，共同拟定将被列入美国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的对象。3月17日，克里米亚公投后的第二天，美国宣布发起新的制裁措施，奥巴马签署第13661号行政命令，扩大第13660号命令中规定的美国制裁的法律范围，将SDN制裁的授权范围从乌克兰(尤其是克里米亚地区个人)增加至“对乌克兰局势负有责任的俄罗斯官员”。两天后，奥巴马签署第13662号行政命令，进一步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俄罗斯金融、能源、国防及相关领域内的个人与实体，为后续的“顿巴斯制裁”奠定了法律基础。

第二阶段是随着克里米亚事件持续升级以及俄罗斯采取混合战争模式介入顿巴斯冲突期间而发起的“顿巴斯制裁”。随着克里米亚事件外溢至顿巴斯地区，美国对俄罗斯发出制裁升级的威胁，要求俄罗斯履行日内瓦协议，停止介入乌克兰局势。^② 然而，美国方面认为，俄罗斯不仅没有停止反倒持续增强对顿巴斯分离武装的暗中支持，便进一步将制裁升级为对俄罗斯金融、能源和国防工业的多部门制裁。4月28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新增制裁17家“与普京核心圈子存在联系”的公司，商务部对13家公司实施出口管制，国务院则宣布撤销先前对俄罗斯出口军工科技产品的许可令。^③ 其中，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扩大对《出口管理条例》(EAR)所列特定物品的出口限制，拒绝任何旨在向俄罗斯或克里米亚出口或再出口受《出口管制条例》限制的、被认为有助于俄罗斯军事能力的高科技产品的许可证申请，并获准撤销制裁范围内的任何现有出口许可证，从而对俄罗斯军工部门发起了第一轮“部门制裁”。7月16日，美财政部援引第13662号行政令，将对俄制裁

①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13660 of March 6, 2014,” March 6, 2014, [https://ofac.treasury.gov/media/5946/download? inline](https://ofac.treasury.gov/media/5946/download?inlin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② The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by the Press Secretary Jay Carney,” April 21, 2014,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4/21/press-briefing-press-secretary-jay-carney-42114>,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③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the Press Secretary on Ukraine,” April 28, 2014,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4/28/statement-press-secretary-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范围扩大至金融和能源部门,在新增制裁4名俄高官、8家军工企业的同时,首次对俄天然气工业银行(Gazprombank)、俄罗斯国有银行 Vneshekonombank (VEB),以及俄私营天然气公司 Novatek 和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实施金融制裁,禁止美国金融市场及投资人与其开展中长期(超过90天)融资项目合作。^① 7月29日,美国财政部新增制裁3家俄罗斯国有金融机构和1家俄军工企业。^② 9月12日,美财政部将融资许可期限从90天缩短至30天,追加制裁俄最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并对包括大型国有联合企业俄罗斯技术公司(Rostec)在内的国防公司实施金融限制,将西方实体发行的债务期限限制在30天内。^③ 2014年底,眼见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已成定局,奥巴马签署13685号行政命令,全面禁止美国企业或个人(无论位于何处)前往克里米亚地区进行投资、进出口或融资活动。^④

为什么该制裁被评估为中等强度精准制裁?一方面,美国制裁的对象范围仅包括部分高官与企业,并未涵盖绝大部分俄罗斯国民;另一方面,美国对俄制裁的权力手段具有网络性,既体现在美国联合欧盟对俄罗斯发起了多边经济制裁,也体现在美国以行政命令授权制裁执法部门对违反美国制裁法规的任意第三方实体发起次级制裁。

为什么美国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对俄罗斯采取了中等强度精准制裁?根据经济制裁强度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从美国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和反噬成本两方面进行分析。

①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ment of Treasury Sanctions on Entities With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Energy Sectors of Russia, Against Arms or Related Materiel Entities, and Those Undermining Ukraine's Sovereignty," July 16, 2014,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l2572>,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②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ment of Additional Treasury Sanctions on Russi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n a Defense Technology Entity," July 29, 2014,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l2590>,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③ The White House, "Announcement of Expanded Treasury Sanctions within the Russian Financial Services, Energy and Defense or Related Materiel Sectors," September 12, 2014,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l2629>,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④ White House Press Office, "Executive Order 13685 of December 19, 2014," December 19, 2014, <https://ofac.treasury.gov/media/8776/download?inlin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2. 美国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

整体来看,克里米亚事件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对俄罗斯军事行为的安全认知趋向于具有威胁性。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重金融轻实业经济结构的危害,^①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进一步引发了美国对霸权衰落的国际隐忧。^②此外,大国行为模式的改变,更是加剧了美国对其地区秩序主导权的威胁认知,进而推出旨在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与北约东扩战略。^③2012年以来,由于普京再度出任俄罗斯总统,并推出旨在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欧亚联盟,奥巴马上任伊始为推动美俄关系“重启”而暂停的北约东扩再次成为美国削弱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举措。^④2014年3月25日,奥巴马表示:“俄罗斯是一个地区大国,它对邻国的威胁不是出于实力,而是出于软弱”,“俄罗斯是一个问题,(但)他们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⑤然而,在9月24日联大年度会议发言时,奥巴马却进一步提升了对俄罗斯的威胁评估,将俄罗斯与埃博拉病毒和“伊斯兰国”并称为全球三大威胁。^⑥

第二,克里米亚事件在美国国内的议题显著性较高。与格鲁吉亚相比,乌克兰的战略价值显然更高,是独联体国家中唯一可以同俄罗斯抗衡的力量。^⑦

① 宋国友:《美国霸权衰落的经济逻辑》,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第54—65页。

② Zhang Xiaotong and James Keith, “From Wealth to Power: China’s New Economic Statecraf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1, 2017, pp. 185-203.

③ 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第40—44页。

④ 张建、周琪:《奥巴马第二任期美俄关系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84—105页。

⑤ The White House, “Pres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Rutte of the Netherlands,” March 25, 2014,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3/25/press-conference-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rutte-netherlands>,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⑥ David Nakamura, “At UN, Obama Calls for Unified Approach to Tackle Islamic State, Ebola, Ukraine Crise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4, 201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at-un-obama-calls-for-unified-approach-to-tackle-islamic-state-ebola-ukraine-crises/2014/09/24/9b32cb9c-43f5-11e4-b437-1a7368204804_story.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⑦ 梁强:《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战略目标——基于美乌关系的分析(1992~2014)》,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2期,第14页。

布热津斯基曾指出,乌克兰对美国“欧亚大棋局”起着战略支轴的重要作用,^①拉拢乌克兰对于破解俄罗斯构建欧亚联盟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如图6所示,相比俄格冲突,美国民众对克里米亚事件引发的乌克兰危机的关注度明显增加。在危机爆发的3月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福克斯的单月新闻报道量都超过了150条。随着7月马航MH17事件的发生,美国国内再度出现对乌克兰议题的密集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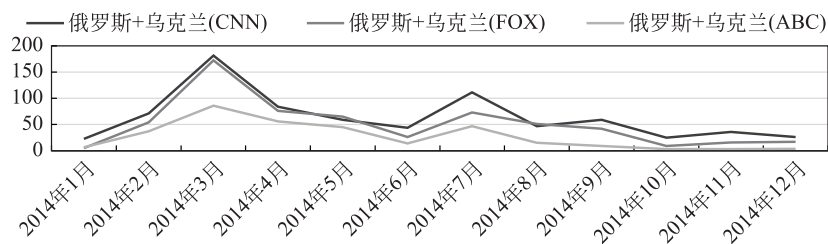


图6 美国CNN、FOX、ABC涵盖“俄罗斯+乌克兰”的媒体报道数(2014年)

资料来源:Lexis Advance, <https://www.lexisnexis.ca/en-ca/products/lexis-advance-quicklaw-overview.page>。

第三,美国希望采取强硬措施来威慑俄罗斯。布热津斯基认为,西方如果不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行动作出回应,会释放出类似二战爆发前对德国占领苏台德的绥靖信号,诱使俄罗斯进一步占领乌东地区,最终兼并整个乌克兰。^② 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努兰(Victoria Nuland)指出,美国制裁的目的是迫使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暴力活动,并全面履行其在明斯克协议中的承诺。^③ 前任国务卿赖斯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向俄罗斯表明(美国)不会容忍更进一步的行动。如果不加以重视,全

①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② “What Is to Be Done? Putin’s Aggression in Ukraine Needs a Response,”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3,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zbigniew-brzezinski-after-putins-aggression-in-ukraine-the-west-must-be-ready-to-respond/2014/03/03/25b3f928-a2f5-11e3-84d4-e59b1709222c_story.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③ Victoria Nuland, “Testimony Victoria Nuland: Russian Violations of Borders, Treaties, and Human Rights,” June 7, 2016, <https://2009-2017.state.gov/p/eur/rls/rm/2016/jun/258167.htm>,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球的独裁者和极端分子将会更加肆无忌惮。”^①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也认为,尽管经济制裁可能起不到威慑俄罗斯的作用,但“我们必须看看现实情况,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直接的军事选项”。^②

美国威胁认知的转变、议题显著性的提高以及美国威慑俄罗斯防止战事扩大化,导致美国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此时,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经济制裁的动机很高,可以选择高强度的网络化制裁,也可以选择中等强度的精准制裁。为什么美国最终选择中等强度的精准制裁?这与美国对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的考虑有关。

3. 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反噬成本较高

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反噬成本较高。一方面,美俄企业层面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网络主要中心节点的欧盟不愿对俄罗斯实施高强度经济制裁。

受限于美俄整体经贸联系的有限性,美国实施制裁对本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但难免会给特定的美国公司带来经济成本。例如,埃克森美孚公司于2011年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预计投资数百亿美元,在俄罗斯北极进行钻探活动;Visa和MasterCard占有俄罗斯市场90%以上业务等。^③2014年6月,美国两大商业游说团体在美国各大媒体刊登广告,警告美国对俄制裁将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减少就业机会,并将商业机会让给其他国家的企业。^④

① “Will America Heed the Wake-up Call of Ukraine?” March 7, 2014,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condoleezza-riche-will-america-heed-the-wake-up-call-of-ukraine/2014/03/07/cf087f74-a630-11e3-84d4-e59b1709222c_story.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② “Robert Gates on Ukraine Crisis, ‘Reset’ with Russia; Sen. Rand Paul Lays Out Vision for America at CPAC,” Fox News, March 9, 2014, <https://www.foxnews.com/transcript/robert-gates-on-ukraine-crisis-reset-with-russia-sen-rand-paul-lays-out-vision-for-america-at-cpac>,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③ Rebecca M. Nelson, “U. S. -Russia Economic Relations,” August 1, 2014, <https://sgp.fas.org/crs/row/IN10119.pdf>,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④ “US Business to Run Ads Against Russian Sanctions,” Russia Today, June 25, 2014, <https://www.rt.com/business/168384-us-businesses-russian-sanctions/>,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作为国际经济网络主要中心节点的欧盟内部对是否严厉制裁俄罗斯存在较大分歧。虽然欧盟认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单方面改变领土现状的做法不可接受,但不同成员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存在明显区别:东欧国家普遍主张对俄强硬,而德法等国与俄罗斯存在较高的经贸依存度,不愿采取可能刺激俄罗斯的强硬政策。^① 欧盟核心的德法两国均主张外交解决争端,仅对俄罗斯少数个人发起旅行禁令与资产冻结的象征性经济制裁。直到7月马航MH17事件后,德法两国才同意追加制裁,但措施仅限于禁止几家俄罗斯能源公司在欧洲市场的融资活动,甚至不包括占俄欧经贸大头的能源贸易。时任波兰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Bronisław Komorowski)称,俄罗斯的行动“使波兰的安全受到威胁”,并立即对俄罗斯表示谴责,且同意对乌克兰进行经济援助和军售谈判,但同样拒绝对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援助。^② 2015年3月,美国曾提议对俄罗斯发起SWIFT制裁,但由于欧盟反对而作罢。^③

总体上,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且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也较高,使美国在减少对美跨国公司的经济影响和延缓网络结构演变速率的考量下对俄罗斯发起了中等强度的定向制裁。这表明,本文假说2(当发起国实施制裁声誉需求较高且制裁的反噬成本也较高时,发起国倾向于发起中等强度经济制裁)提出的理论假说与经验事实一致。

(三) 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发起高强度经济制裁

1. 美国对俄罗斯发起高强度经济制裁

早在2021年11月,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俄罗斯军队集结动向后,拜登制裁团队便开始起草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战略。^④ 冲突爆发后,美国迅速对

① Hans Kundnani, "Leaving the West Behind: Germany Looks East," *Foreign Affairs*, Vol. 94, No. 1, 2015, pp. 108-116.

② 孔田平:《波兰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及其根源》,载《俄罗斯学刊》,2018年第4期,第32页。

③ 马鑫、许钊颖:《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5期,第41页。

④ "The Biden Experts Waging War without Weapons: The Russia Sanctions Are an Unprecedented Economic Assault," *Vox*, May 9, 2022, <https://www.vox.com/23041830/technocrats-waging-bidens-war-sanctions-russia>,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俄罗斯实施一揽子近乎极限施压的经济制裁,维持至今并不断强化。

2月21日,拜登签署第14065号行政令,沿用并扩大奥巴马第13660号行政令的制裁框架,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发起全面封锁。^①2月24日,俄乌冲突正式爆发,拜登旋即冻结5家俄罗斯银行的美元资产,并授权美国政府各部门发起对俄经济制裁。^②同日,美商务部修改对俄出口管制条例,大幅收紧对俄高新技术的管制范围,并把51家俄企业列入实体清单。^③25日,白宫宣布将与欧盟一道制裁俄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开创了将大国最高领导人列为制裁对象的先例。^④28日,美财政部对俄罗斯央行、国家财富基金和财政部实施制裁,冻结了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⑤

3月2日,美国、英国与欧盟联合宣布对俄罗斯发起SWIFT制裁,断开俄罗斯外贸银行、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等7个指定的俄罗斯银行及其子公司同SWIFT系统之间的联系,但运营俄罗斯与欧盟能源交易的俄联邦储蓄银行和天然气工业银行,没有被列入本轮SWIFT制裁清单。3月11日,拜登签署第14068号行政令,禁止美国人参与俄罗斯能源、海鲜和奢侈品领域的

① The White House, “Notice o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 with Respect to Ukraine,” March 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02/notice-on-the-continuation-of-the-national-emergency-with-respect-to-ukraine-2/>,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②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Russia’s Unprovoked and Unjustified Attack on Ukraine,”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2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russias-unprovoked-and-unjustified-attack-on-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③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Russia and Belarus Rule Fact Sheet,”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news/fact-sheets/2022/02/us-department-commerce-bureau-industry-and-security-russia-and-belarus>,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④ 刘建伟:《美国制裁改革背景下的对俄经济制裁》,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3期,第49页。

⑤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reasury Prohibits Transactions with Central Bank of Russia and Imposes Sanctions on Key Sources of Russia’s Wealth,” February, 28, 2022,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0612>,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投资与贸易活动。^① 4月9日,拜登签署《暂停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对大多数原产俄罗斯的金属和矿产加征35%的关税。^②

为什么该制裁被评估为高强度的全面网络化制裁?一方面,美国制裁对象的影响范围涵盖绝大部分俄罗斯国民,除全俄第三大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外,几乎所有俄罗斯银行、能源和军工企业均被列入美国制裁清单;另一方面,美国使用了网络性权力实施制裁,除切断SWIFT外,还开展了针对第三方的制裁规避域外执法活动。例如,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OFAC)不断将俄罗斯的海外注册公司以及同俄罗斯开展交易的第三方公司列入SDN清单,强化对俄制裁压力。

为什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伊始美国迅速决定对俄罗斯高强度经济制裁?根据经济制裁强度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从美国发起制裁的声誉需求和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2. 美国发起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

此时,美国对俄罗斯发起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威胁认知较高。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政纲,促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从反恐向大国竞争转变。^③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国安战略转型,自阿富汗全面撤军,将战略重心彻底转向应对大国竞争。^④ 另一方面,美

①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Prohibiting Certain Imports, Exports, and New Investment with Respect to Continued Russian Federation Aggressio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3/11/executive-order-on-prohibiting-certain-imports-exports-and-new-investment-with-respect-to-continued-russian-federation-aggression/>,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② “US, EU and UK Maintain Pressure Through Russia Sanctions,” <https://www.shearman.com/en/perspectives/2023/09/us-eu-and-uk-maintain-pressure-through-russia-sanctions>,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③ 赵明昊:《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态势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4—31页。

④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26—55页。

国认为俄罗斯此时已不满足在克里米亚的既得利益,而是要将“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从地图上抹去”。^①早在冲突爆发前,拜登就曾对俄罗斯发出制裁威胁,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是“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入侵”“这将改变世界”。^②《外交政策》专栏作者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认为,俄乌冲突是对美国二战后建立的国际安全 and 经济秩序构成的最大挑战,“与普京刚刚启动的危机相比,二战结束以来的大多数其他重大全球危机似乎都不足为道。”^③

第二,美国对俄乌冲突事件显著性的评估较高。如图7所示,美国国内对俄乌冲突的关注度空前提高,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单月报道数量在3月超过500条,随后基本保持每月100条左右的报道量。2022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85%)美国公众要求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发起制裁,其中63%的公众支持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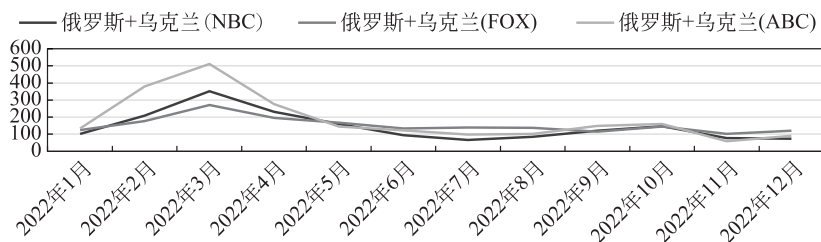


图7 美国NBC、FOX、ABC涵盖“俄罗斯+乌克兰”的媒体报道数(2022年)

资料来源: Lexis Advance, <https://www.lexisnexis.ca/en-ca/products/lexis-advance-quicklaw-overview.page>。

① “‘Putin Wants to Erase Ukraine from the World Map,’ Says Former Ukrainian President,” CBC News, April 21, 2022, <https://www.cbc.ca/player/play/2025692739526>,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② “Biden Says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Could Be ‘Largest Invasion Since WWII’,” Newsweek, January 25, 2022, <https://www.newsweek.com/biden-says-russian-invasion-ukraine-could-largest-invasion-since-wwii-1672945>,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③ Michael Hirsh, “Why Putin’s War Is the West’s Biggest Test Since Wor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4,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2/24/russia-ukraine-war-west-world-war-2/>,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④ “Public Expresses Mixed Views of U. S. Response to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15,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2/03/15/public-expresses-mixed-views-of-u-s-response-to-russias-invasion-of-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第三,美国希望展示制裁决心来发出威慑信号。2023年6月2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芬兰发表演说,不仅指斥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还公然宣称中国正因台湾问题而高度关注美西方对俄乌冲突的处理办法。^①10月20日,拜登评论巴以局势时说,“如果我们不阻止普京对乌克兰的权力欲和控制欲,他就不会将自己限制在乌克兰”“如果我们袖手旁观,任由普京抹杀乌克兰的独立,那么世界各地的潜在侵略者就会有恃无恐,妄图有样学样。”^②此外,美国国防部《2022国防战略》提出“一体化威慑”(integrity deterrence)概念,矛头直指中国,暗示可综合运用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和经济金融的非对称优势,通过经济制裁、出口管制等手段来填补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日益下降的对华军事威慑能力。^③左希迎认为,当前美国正在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形成强大威慑效用的工具,通过展示俄罗斯承担的高昂成本来塑造中国统一时必须承担高昂成本的心理预期,最终改变中国领导人和民众的心理认知和战略安排。^④美国战略界也认为,在因阿富汗撤军等过去行动导致美国可信度不足的阴影下,继续支持乌克兰可以发出新的信号,向中国表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⑤

美国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加剧、事件显著性较高且希望发出威慑信号,导致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此时,美国可以发起中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ussia’s Strategic Failure and Ukraine’s Secure Future,” June 2, 2023, <https://www.state.gov/russias-strategic-failure-and-ukraines-secure-futur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②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se to Hamas’s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Israel and Russia’s Ongoing Brutal War Against Ukraine,” October 20,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10/20/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united-states-response-to-hamas-terrorist-attacks-against-israel-and-russias-ongoing-brutal-war-against-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③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9, <https://www.defense.gov/National-Defense-Strategy/>,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④ 左希迎:《美国威慑战略与俄乌冲突》,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5期,第9页。

⑤ “Why American Credibility on Taiwan is at Stake in Ukraine,”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June 27, 2023, <https://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why-american-credibility-on-taiwan-is-at-stake-in-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等强度经济制裁,也可以选择高强度经济制裁。那么,为什么俄乌冲突甫一爆发,美国就迅速采取了高强度经济制裁?这与美国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有关。

3. 美国实施高强度制裁的反噬成本较低

此时,美国对俄罗斯发起高强度经济制裁的反噬成本较低,体现在美俄跨国公司的业务减少与欧盟对俄制裁的意愿极大增强两个方面。美国对俄罗斯发起高强度经济制裁的反噬成本空前降低,促使美国迅速对俄罗斯做出高强度经济制裁的外交决策。

美国公司大规模剥离在俄业务,导致美俄两国整体经济联系进一步减弱。自页岩油革命以来,美国已经由过去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全球主要的能源出口国,且对俄能源进口仅占美国石油进口的8%,受全球能源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为可控。^①此外,在俄乌冲突发生之际,出于声誉损失或道义动机,许多美国企业自发退出俄罗斯市场,进一步降低了俄罗斯利用市场规模对美反制的商业杠杆。根据泰蒂亚娜·巴柳科(Tetyana Balyuk)和阿纳斯塔西亚·费迪克(Anastassia Fedyk)的统计,2022年2月24日至3月31日期间,超过66%的美国企业选择限制其在俄罗斯的业务,其中26%宣布退出,51%宣布暂停营业,23%缩减其在俄罗斯的现有业务。^②

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相比,此时德法两国已基本放弃安抚俄罗斯来谋求外交妥协的做法。2022年2月22日,在普京正式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后,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俄罗斯的行为是“不合理且不可理解的”,并暂停俄罗斯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认证过程。^③与特朗普相比,拜登显然更

① “The United States Imports More Petroleum Products than Crude Oil from Russia,” *Today in Energy*, March, 22, 2022,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51738>,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② Tetyana Balyuk and Anastassia Fedyk, “Divesting Under Pressure: U. S. Firms’ Exit in Response to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51, No. 4, 2023, p. 1254.

③ “Germany Halts Nord Stream 2 Approval,” *DW*, February 22, 2022, <https://www.dw.com/en/ukraine-crisis-germany-halts-nord-stream-2-approval/a-60867443>,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注重与盟友的协同合作。^① 2月24日,拜登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俄罗斯发起 SWIFT 制裁)始终是一种选择,但目前,这并不是欧洲其他国家希望采取的行动。”^② 2月27日,在欧盟核心德国宣布转变国家安全政策,改变了坚持数十年“不向战乱地区输送致命性武器”的传统,并破例对俄煤炭、部分能源实施禁运后,^③ 获得欧盟协调的美国才对俄罗斯发起外汇冻结和 SWIFT 制裁。

综上,俄乌冲突期间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但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较低,使美国迅速对俄罗斯采取了高强度经济制裁。这表明本文假说3(当发起国实施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但制裁的反噬成本较低时,发起国倾向于发起高强度经济制裁)提出的理论假说与经验事实一致。

五、结论

通过构建“发起国发起制裁的声誉需求+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的理论框架,本文探讨了发起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强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本文提出,发起国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和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共同影响了发起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强度差异。

实证分析表明,2008年俄格冲突,美国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低,因而美国对俄罗斯采取了象征性的低强度经济制裁;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美国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且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也较高,导致美国对俄罗斯采取了中等强度的定向制裁;2022年俄乌冲突,美国发起经济制裁的声誉需求较高,但实施制裁的反噬成本较低,使得美国迅速对俄

① 与特朗普不顾欧盟反对执意退出伊核协议并制裁伊朗相比,拜登实施对俄经济制裁时显然有更高的顺势而为、谈判导向等“个性特质”。参见李宏洲、尹继武:《拜登的人格特质及决策特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2期,第11—22页。

②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Russia’s Unprovoked and Unjustified Attack on Ukraine,”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2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russias-unprovoked-and-unjustified-attack-on-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

③ 李超:《俄乌冲突下的德国安全政策调整》,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6期,第12—19页。

罗斯发起了高强度的网络化制裁。

从学理的角度来看,本文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经济制裁的强度理论,将强制外交的决心-成本平衡理论引入经济制裁研究,进一步强调了成本-收益的理性主义模型在发起国对外经济制裁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本文也对经济制裁强度及其形式划分议程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既有研究更多从制裁发起国视角出发关注何种经济制裁形式更有效,对从目标国视角出发探讨何种经济制裁强度更高的关注较少,本文根据经济制裁的对象范围和权力手段对经济制裁强度的划分,对此提供了有益的补充。